

大中东行记

张信刚

2010年12月,一个突尼斯小贩的自焚,改变了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历史进程。

突尼斯群众持续大规模示威,当权二十三年的本·阿里被逼出走。接着,埃及群众推翻了掌权三十年的穆巴拉克。两人都被起诉,两国都在修改宪法,准备选举新政府,结果很难预料。

波斯湾岛国巴林的什叶派群众冲击逊尼派王室,政府以武力镇压,又有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前景尚不明朗。

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和卡扎菲政府由一方示威和一方镇压演变成全面内战;西方国家以武力积极支持反对派,在位四十二年的卡扎菲大势已去。利比亚行将分裂,前途堪虑。

也门两派冲突不断升级,首都萨那战火纷飞。在位三十三年来的萨利赫以拖待变,在去留之间徘徊了数月之后,终因受伤而出走。也门的局势很难预料。

叙利亚先静后乱,反对派的示威浪潮逐步升高,巴沙尔·阿萨德的政府内似乎有镇压和怀柔两派,近月来软硬兼施,似乎还有相当的支持者,但已很难扭转乾坤,重建威权统治。

摩洛哥、约旦、黎巴嫩和伊朗等多国的反政府力量也在寻找机会,随时可能造成风潮。

美国于此时刺杀了“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将反恐战争带入一个新阶段,也使奥巴马政府得以制定它的新中东政策。

将来无论谁下台谁上台,不论美国和它的盟友采取何种政策,阿拉伯各国的人民已经觉醒,中东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态必将出现深刻变化。

众多伊斯兰国家的动乱似乎会使它们更难共同对付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十分清醒,这些伊斯兰国家的变化极可能会给它带来比过去更为严峻的挑战。

这一切都说明,这个我称为“大中东”的地区确实是危机丛生,很值得关心时局的人们密切注视和进一步了解。

“中东”是近百年来由欧洲人开始使用的名词,一般指亚、非、欧三大洲相交的地区,定义并不准确。传统上中东包括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伊朗、土耳其,共十六个国家。除了以色列,其余十五个都是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伊斯兰国家。

与上述的十六个中东国家相毗连的还有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五个位于非洲的阿拉伯国家。这二十一国合起来可称为“文化中东”。

此外,有十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与“文

化中东”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的命运难以与这二十一国切割。这十个国家是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以及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和索马里。在这十个国家中，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七国的主要人口是基督教徒；阿塞拜疆、吉布提、索马里三国的主要人口是穆斯林。

以上三十一个国家（再加上伊朗之东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地区，是世界历史上不同文明冲突与交融最为显著的地区，也是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集中表现的地区，可以合称为“大中东”。

“大中东”三十一国中，二十三个是伊斯兰国家；除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朗外，其余二十个是阿拉伯联盟的成员国。

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定会同意，大中东是农业和畜牧业的起始点，城市文明的发源地，象形和拼音两类文字的首创区，世界三大“一神教”的诞生地。

战略专家、能源专家和军事专家都会同意，大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战略地位最重要，能源储量最丰富，武器装备购买额最高和国际冲突热点最多的区域。

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会同意，大中东大部分国家宗教气氛浓厚，专制统治盛行，经济发展滞后。

虽然在大中东地区的三十一个国家中有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却不能将这个广大地区定位为伊斯兰地区。同理，不能因为这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中有二十个是阿拉伯联盟成员而把它们都视为阿拉伯文化区。然而，由于阿拉伯联盟的二十二个成员国有二十个在“大中东”，我们可以认为“阿拉伯世界”涵盖在“大中东”之内。

大中东的八个非伊斯兰国家具有鲜明的特色，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才突显了大中

东地区复杂纷纭的本质。

这八个非伊斯兰国家都缺乏石油资源。除以色列外，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它们的伊斯兰邻国大致相当。除希腊和亚美尼亚外，其他六国境内都有很高比例的穆斯林人口，处于所谓“文明冲突”的风口浪尖上。

既然大中东地区的三十一个国家中有二十三个是伊斯兰国家，而伊斯兰复兴又是近三十年来的世界趋势，要了解大中东就必须要对伊斯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有所认识。

由于中东地区与欧洲接近，伊斯兰社会接触欧洲近代文明较印度和中国为早。奥斯曼帝国在十八世纪末期就聘请法国军官开办新式军官学校，并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埃及在十九世纪初开始引进欧洲的军事和邮政制度。

一百多年来，大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可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愿意向西方学习、接受国家世俗化概念、倾向民族主义的“西化派”，主要是军人和专业人员。第二类是希望通过伊斯兰复兴而振兴社会的“伊斯兰主义者”，包括许多在伊斯兰社会具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学者；其中的温和派鼓吹建立符合伊斯兰教义的现代社会，激烈派则敌视西方，主张清除一切违反伊斯兰教义和礼仪的外来习俗。第三类是教育程度不高、居大多数的中下阶层，他们有朴素的宗



马耳他首都瓦莱塔一景

教认同和民族感情,看法较易受伊斯兰宗教学者的影响。

经过百余年的演变,这三类穆斯林目前在不同国家的比例各不相同。他们之间力量的消长将会决定大中东地区的未来。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世界进入了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兴起了伊斯兰复兴运动。

这两大趋势使所有伊斯兰国家都面对外界和内部的双重挑战。虽然不同国家的应对有异,但大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整体表现是政治民主化迟缓,经济全球化滞后。这就意味着它们可能要面对国内纷扰和在国际竞争中被边缘化的双重危机。

在大中东的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中,有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三种政体。不论实行哪种制度,当政者大权独揽的现象非常普遍,“家天下”的色彩浓厚,家族、部族联盟往往是支持政权的主要力量。当拉丁美洲和亚洲各国纷纷摆脱权威政治、逐渐进行民主化之时,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当权者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只以“我国情况特殊”来推诿,或者“口头上附和,行动上拖延”。伊斯兰国家都没有民主传统,移植西方的制度也未必有效。但故步自封绝非长久之计。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两个隔波斯湾相望的产油大国,一个自认是逊尼派伊斯兰的正统,另一个是什叶派伊斯兰的当然中心;一个亲西方,另一个则反西方,但它们却一致地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

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都是二十世纪中叶时,由军人通过革命建立的世俗化政权。这批军人当政后,在政治上压制伊斯兰主义者,在经济政策上初期照顾社会的中下阶层,因此得到普通百姓的拥戴。当政若干年后,他们的家人和亲信者都已成为权贵,在政策上逐渐偏向上层,令

社会贫富悬殊,引起一般百姓的不满。最后,这批统治者逐一变成称做“总统”的国王。

也门和索马里隔亚丁湾相望,两国都相当贫穷落后,虽然借用“议会”等现代名词,实际上没有脱离部族政治的传统。也门经过多年内战后,1990年由南、北也门合并而成;双方之间既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也有历史夙怨。现任总统萨利赫去职后,也门很可能陷入混乱或内战。

索马里十九世纪时分别属于英国和意大利,近二十年来不同部族的军阀混战,加上美国、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军事干预,现在实际上有三个政权。在西部和北部的政权还能实行有效统治;面对印度洋的主要部分,名义上由占领着首都摩加迪沙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统治,实际上是不同派系军阀各自为政、海盗猖獗的“失败国家”。

在这二十三个国家中,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最为坚实稳定。自1923年成为共和国后,经过阿塔图克积极推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土耳其奠定了现代世俗化国家的基础。1938年阿塔图克去世后,土耳其又经过半个世纪由军人监督文人政府的“训政”时期,最近十年来实现了步入常规的民主选举制度。土耳其经过八十年的“激进世俗派”执政之后,最近十年来民选政府是曾遭查禁的温和伊斯兰政党。这说明历史发展的趋势必须用“长时段”来观察;伊斯兰的文化和社会传统的确很坚韧,正如儒家传统在中国不可能轻易地被“打倒孔家店”或是“破四旧,立四新”的短期运动所消灭。

经济上,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可以分为产油国和非产油国。

产油国的国民收入虽然较高,但石油价格受局势影响,收入不稳定。这些国家人力资源缺乏,总人数偏低,海湾国家的“外劳”人口往往多于本地总人口。这些产油国大都未能实现经济多元化,仍属于“单一经

济”。然而,阿联酋和卡塔尔已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成绩颇为可观。

非产油国的一般情况很不理想。近年来人口压力加大,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上贪污腐败随处可见,人心极为涣散。在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明显落后于亚洲与拉丁美洲。

土耳其在大中东的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中,经济发展也比较理想。它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逐渐趋于合理化;私有的中小企业为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活力。作为一个非产油国,有七千多万人口的土耳其2010年的购买力平价(PPP)人均GDP为一万二千四百美元,是埃及的两倍,沙特阿拉伯的一半,与伊朗以及业已加入欧盟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大致相若。

当今世界上,除了经济和文化领域明显占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面对一个挑战:如何一方面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日益缩小的地球上具有竞争力?

这个挑战对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来说格外严峻,因为这些国家内部都有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及受到西方同情和支持的西化派。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时,它们必须找到国内两种力量都能认同的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内耗。

举例来说,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参与度较男性低许多,西化派精英主张提高女权,但是传统派(包括许多女性)的思维还很难改变。一个社会如果忽视它一半人口的智能开发,又想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竞争力,的确极为困难。看似文化冲突的“女权”问题,实际上是社会 and 经济发展路向的选择。

近半年来,多个大中东国家的人民已经对专权腐败而不能领导社会前进的统治者发出了怒吼。希望当前的动乱是生育婴儿

前的阵痛,而不是宿疾引发的痉挛。

大中东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然,政权变动的国家一定会经过一段调整期,贫穷、落后、贪污等现象也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然而,改变的时机毕竟出现了。最近的政治动荡既反映各国的内部矛盾,也有大国博弈的因素,更表现出各地单纯的百姓冀求通过变革获得美好生活的愿望。许多人已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中做出了抉择。大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在未来几年里选择何种政治及社会的发展道路,将是影响本世纪全球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

对所有大中东国家来说,它们的领土和人口组成是由一百多年前的大国角力所决定的,本地区的人民没有机会参与。

今天,不少国家的人民正在用游行、呐喊和石块表达自己的意志。摆在他们面前的两个现实问题是:政治如何民主化?国家应否世俗化?对不同国家来说,可供选择的空間很不相同。

先说政治民主化。民主的真谛是人民有权利选择并监督政府,目的是寻求幸福生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量受过教育并且具有公民意识的人民,即使有选举的程序,也不会达至平等而有效的参与,因此选民也难以通过投票得到幸福生活。此外,截然相左的国家认同和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很难以投票解决。否则,英国何至于长期遭受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袭击?不幸的是,大中东地区的国家多数都有民族和宗教冲突,因而,它们民主化的选择空间就颇受限制。

譬如说,库尔德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也有固定的居住区域。二十世纪初的地缘政治使库尔德人的居住区域分别属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多数的库尔德人想要有自己的国家,但他们无法靠投票达成这个目的。而土耳其和伊朗等国也不可能以推行民主来解决它们的“库尔德”

问题。

在波斯湾西部的岛国巴林素有“中东香港”之称。巴林的王室是十八世纪从阿拉伯半岛迁移到岛上的逊尼派穆斯林。他们赶走了属于什叶派的波斯卡加王朝，垄断了收入丰厚的珍珠业。十九世纪，巴林成为英国的保护国。1932年，巴林打出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口油井，改变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战略地位。巴林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什叶派，十年前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但一切大权仍然在国王家庭手中。最近巴林政府出动军队镇压示威，死伤不少；示威平定后，政府解雇了许多人，进行“秋后算账”，然而这不但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谴责，反而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强力支持。

再说国家世俗化。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的概念，即公民可以有信仰自由，但国家不可遵奉任何宗教。在伊斯兰国家，政教分离是一个极难解决的课题。由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不少伊斯兰学者认为，国家世俗化等于是背弃伊斯兰传统。

奥斯曼帝国末期，帝国内部以基督教徒为主的地区（如希腊）纷纷在列强支持下独立。在帝国大厦将倾之际，奥斯曼上层借苏丹兼任哈里发的理由，鼓吹“泛伊斯兰主义”，企图以宗教来维系帝国境内的穆斯林人口，尤其是在英、法鼓动下日益离心的阿拉伯人。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土耳其共和国

废除苏丹制度，解散苏非教团，由政府管理宗教寺院和财产，以世俗法律替代伊斯兰教法。八十多年来，世俗主义在很大比例的土耳其人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他们虽然与伊斯兰主义者经常宣辩，但几乎没有共同语言。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都是世俗化政权，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国内都有大量基督教徒；而它们早期的领导人都都提倡包括基督教徒在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同样是世俗化，埃及与土耳其在程度上就很不同。土耳其的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实行世俗主义，而埃及现行的宪法规定国家法律不可与伊斯兰教法相抵触，隐含地承认伊斯兰是埃及的国教。在2011年初埃及的动乱中，副总统苏莱曼和最高军事会议发言人在电视讲话中，都依照穆斯林的惯例，发言的第一句是赞颂至仁至慈的真主。这个情况在土耳其绝不可能发生。

在今日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强人倒下后，军人集团势必会在新政权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如果新政权选择国家世俗化，必将令参与推倒强人的伊斯兰主义者强烈不满，造成社会进一步分化；如果新政权强调伊斯兰教法，它就很难与一向遭军人集团压制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划清界限，不仅会遭到西方国家的疑忌，也会令国内许多受到西方价值观影响的专业人士不满，从而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自从突尼斯和埃及政局剧变之后，全世界许多媒体都在猜测将来中东各国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在大中东三十一个国家中，实际上只有伊朗、埃及和土耳其这三个国家有可能成为他国模仿的对象。恰巧，这三个国家各有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传统，也各有其吸引力和影响范围。

伊朗是由什叶派教士控制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朗的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相信，他们早期的领袖第十二位伊玛目并未归真，只是



作者摄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

选择隐遁,日后将会重返人间。在此之前,他的职位由为数极少的阿亚图拉暂代。因此阿亚图拉在宗教上的宣示一定正确。这个信仰很类似于天主教认为教宗是耶稣在世上的代表,因此不会犯错的信条。虽然目前伊朗实行的是神权政治,但什叶派的教义比逊尼派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加重视“公众议决”的法学原则,因此与现代民主概念没有本质的冲突。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地理和文化中心,因此阿拉伯联盟总部设在开罗。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军人几乎不可能真正远离政治,回归营房。毕竟,埃及历史上的马木留克王朝(13?16世纪)是由非世袭的军事将领出任苏丹。近六十年来的埃及政府实际上就是军事集团推选代表担任总统。今后埃及的军事集团如何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支持民选政府疗治社会创伤,团结基督教徒,促成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合作,将是本世纪内阿拉伯世界的大事。

土耳其在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成绩都很可观。但是它的内部矛盾也不容低估。库尔德人占全国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短期内很难与突厥族裔同心同德。在世俗化的原则下,伊斯兰政党已经依法当政近十年。2011年6月又赢得了国民议会大选,引起一些世俗派的惶恐,认为社会安宁不会持久。但是,一股既要伊斯兰也要现代化的新力量已经在土耳其出现;在专业人士和工商业者之中,用“天助自助”的信念取代传统上许多穆斯林所倾向的宿命论的新价值观正在悄然兴起。这可能是土耳其经过八十年的摸索之后,对大中东其他伊斯兰国

家的魅力之所在。

2004、2006和2009年,我三次在土耳其两所大学做学术访问,几次听当地人说起西方一些战略家认为:既然伊斯兰力量无法消灭,一个“浅绿”的穆斯林国家的“身教”要比西方政府和传媒的“言传”更有影响力。根据这个说法,西方战略专家情愿土耳其由温和伊斯兰政党执政。

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它背后的逻辑的确代表一种思维的突破,而它的预见已经被近几年的事实所证明。土耳其政府的作为越来越受到大中东地区穆斯林的支持,土耳其电视剧也得到整个大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追捧。

埃及十九世纪末的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阿布杜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早期鼓吹者。他反对西方的侵略和封建君主制;认为宗教可以和科学合作,信仰可以与理性互补。他主张逊尼派法学家应该改变十二世纪以来认为“创制之门”已闭的保守传统,使用早期伊斯兰教法学者所拥有的“独立判断”之权,重启“关闭”了的“教法大门”。

依我看,“大中东”地区哪个伊斯兰国家能够涌现大批“独立判断”的学者,在大众接受的教法范围内找到一条可行的现代化途径,哪个国家就会成为“大中东”伊斯兰国家未来发展的模式。而这一途径最简单的表述方式与中国“五四”时期所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很接近,那就是:“伊斯兰+民主+科学”。

(本文选自张信刚的长篇纪实散文《大中东行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题字:马亚飞)